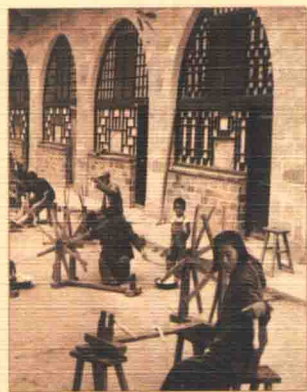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 劳模运动研究



王彩霞◎著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 劳模运动研究

王彩霞◎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研究 / 王彩霞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161-4985-0

I. ①抗… II. ①王… III. ①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史料—研究
IV. ①K269.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182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胡新芳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
插 页 2
字 数 288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发展状况	(13)
第一节 历史渊源与开展条件	(13)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发展概况	(28)
第二章 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的体制机制	(42)
第一节 制度保证——新民主主义政权	(42)
第二节 劳模运动的运作机制	(54)
第三节 边区政权与模范工作者	(78)
第四节 “一揽子”英雄和模范乡村运动	(90)
第五节 劳模群体现象分析	(98)
第三章 陕甘宁边区的宣传与劳模运动	(110)
第一节 劳模运动的宣传者和组织者——《解放日报》	(110)
第二节 文艺宣传与劳模运动	(136)
第四章 劳模运动的社会影响	(153)
第一节 劳模运动对生产和经济的影响	(153)
第二节 劳模参与政权和社会事务	(166)
第三节 劳模运动对共产党政权及其他根据地的影响	(183)
第四节 边区观念与风尚的变化	(196)
第五章 劳模运动开展中的缺陷与政府应对	(222)
第一节 “政府的英雄”——劳模的产生方式	(222)
第二节 “万能英雄”——劳模的定位	(227)
第三节 两种政权或“泰山”政权——劳模与区乡政权、 干部的关系	(234)
第四节 “官”英雄——劳模与群众的关系	(241)

余论	(245)
主要参考文献	(259)
后记	(267)

绪 论

一 本书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陕甘宁边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保存下来的红色区域。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略总后方。

陕甘宁边区成立初期总面积126908平方公里，人口200万人，设26个县。1941年11月，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边区所辖地重新划分为29个县（市），266个区，1549个乡。边区下辖延属分区、三边分区、关中分区、绥德分区、陇东分区，包括陕西、宁夏和甘肃的地域。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总后方与指挥枢纽，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所在地，中共中央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政策往往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实施，继而推广到其他根据地，因而陕甘宁边区的实践活动对其他根据地起了试验与示范作用，陕甘宁边区也因此成为模范边区，不仅对当时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而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也有一定程度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同时，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下，遭到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困难和政治、军事压力。为了渡过难关，保证抗日战争力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提出了“发展生产，自给自足”的政策，并开展了广泛的大生产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陕甘宁边区涌现出一批努力生产同时积极执行共产党各项政策的优秀劳动者，他们主要是一线生产领域的农民和工厂中的工人，后来扩展到包括干部在内的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人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将他们树立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简称“劳模”），对其加以表彰和奖励。在政府的积极组织 and 有效引导

下，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量涌现，并由个人劳动英雄向集体劳动模范发展。由此，在20世纪40年代初中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

1943年底，边区实现粮食自给有余；边区工业也得到很大发展，鞋袜、肥皂、牙刷等各种日用品基本自给。边区军民渡过了物质上最困难的岁月，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更加巩固，同时对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建设也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李维汉回忆说：“这一经济的辉煌成就，是边区千百万劳动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大批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这里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① 1943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模范生产者代表会和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同时开幕，出席大会的劳模代表共185名。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发表讲话说：“这不仅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而且也是东方各民族从来没有过的事。”^② 毛泽东在会上做《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号召通过合作社等形式，把所有力量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1944年12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边区民政厅厅长刘景范在大会上指出：“边区生产的发展及其他各项工作的进步，是同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不能分开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是边区发展生产和各项建设工作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③ 毛泽东在会上做了《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标题改为“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演，指出了劳模的三种作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劳模运动向纵深发展。

劳模运动的发展，和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共产党的政策和宣传、劳动者本身都有密切的关系。它是如何发动、运作并轰轰烈烈搞起来的呢？单纯的精神奖励或物质奖励能否激发老百姓的劳动热情？分散的个体生产的农民可以搞集体合作运动吗？榜样的力量效果如何？在劳模运动中，对劳模正面形象的大规模、全方位宣传，对当时人们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56页。

② 《高岗同志在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与生产展览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7日第1版。

③ 刘景范：《更加推广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运动》，《解放日报》1945年1月25日第1版。

从1938年边区政府开始奖励与宣传生产模范，到1942年劳动英雄不断涌现，1943年底和1944年底召开了两次规模盛大的边区劳模大会，1947年随着边区政府撤离，劳模运动停止，整个劳模运动的过程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几乎同步发展。人们浸染其中，受到的影响有多大？对后世的影响又有多大？这种对劳模运动全面的思考和研究，目前还少有关注。我们不能用正面或负面的标准对其进行简单的定性，而应该在充分考察其历史实况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评价。

陕甘宁边区民政厅厅长刘景范在边区第二届劳模大会上指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其实质就是创造典型和推广典型的运动，其中包括许多具体工作。”^①在抗日战争的情境下，边区政府通过“树典型”的方式来动员群众，最终达到发展生产、支持抗战的目的。通过研究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运动，有助于理解中共群众运动的发起和动员机制；有助于从一个视角阐明陕甘宁边区在当时何以成为模范试验区，从而丰富对陕甘宁边区的研究。

同时，研究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首先，在发起、组织劳模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现：“在这次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再没有那么明显地显示出群众的真正智慧和创造能力。……我们领导生产，必须是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把发展生产变成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②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走群众路线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摸索到部分经济建设、政权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的经验，为激发边区人民生产热情、顺利渡过难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群众路线成为共产党取得全国性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并一直作为共产党的政策沿用至今。

其次，总结劳模运动的经验教训，探讨其中的发生与运作机制，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艰巨任务，党和政府也曾树立过一批典型人物。但在1960—1977年，没有产生评选过一位全国性的劳模。1982年，奖励劳模写入宪法。政府在表彰劳模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

^① 刘景范：《更加推广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运动》，《解放日报》1945年1月25日第1版。

^② 社论《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给我们指出了什么？》，《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6日第1版。

我们都可以从延安时期的劳模运动中找到其渊源，同时也可以从中取得经验和教训，探讨如何对待“典型”和先进，如何对他们培养、教育和使用，如何处理典型人物与政府和干部的关系。同时，这对作为一个执政党思考今天的激励制度、组织制度，都具有借鉴意义。

再次，有助于探讨社会主流意识的培养。边区政府适时组织大规模的表彰劳模的活动，使劳动光荣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劳模除了骄人的生产成绩外，更多的是被作为道德典型来教育群众。劳模运动成为改造群众观念和思想的一种手段。探讨劳模运动，对在当前社会道德观、世界观、价值观多元化的情况下，如何培养社会主流意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最后，反思主流媒体在典型化传播中的经验和教训。在当时看来，延安《解放日报》及其他文艺形式对劳模运动的典型化和集中宣传，效果非常明显。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这种政治导向十分明显、人为痕迹较多的典型化传播是否有泡沫成分呢？榜样面孔的单一也为后世的榜样类型埋下了“单面人”的隐患。典型化传播是中国共产党在以往的新闻传播中经常使用的传播手段。在21世纪，中国面临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继承并发扬传播典型的方法，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建立和谐社会是否仍会有成效？需要反思以往的经验与教训。

二 学术史回顾

鉴于陕甘宁边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重要作用，陕甘宁边区史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关于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运动，目前学术界尚没有专门性的研究著作，只是在某些相关著作和一些论文中有所涉及。

（一）研究陕甘宁边区的著作中带有劳模运动部分的

主要有房成祥、黄兆安主编的《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宋金寿主编的《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黄正林的《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宋金寿、李忠全主编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写组编的《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李智勇的《陕甘宁边区政权

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这些著作对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运动着墨不多，主要是强调劳模的带头作用、桥梁作用和骨干作用，使边区以生产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促进了边区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开展，改变了边区的社会风气等，多为一般性的介绍，没有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二）研究延安精神、延安道路方面的著作中，也有涉及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的

如朱鸿召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选择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对延安时期的某些历史关键问题或趣味敏感话题展开讨论。其中《工人有什么才来劲》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的劳模运动。作者指出，模范工人劳动观念的背后，是将工人放置在军事化和政治化的历史语境下进行人生改造和重新塑造的。随着时间的发展，会带来三个难题：一是工厂里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的行政权力的泛滥和腐化倾向；二是政治化的工人劳动英雄和生产模范，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们失去了一个政治符号的历史功能，逐渐凸显出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时候，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怎样才能得到保障；三是用组织开展群众运动的方式，将工人改造成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和政治标兵的单面人，将所有社会资源都收拢在政治的掌握中，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

美国作者马克·赛尔登在其撰写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中认为：以前在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运动中已涌现出一批民众领袖，现在又涌现出一批劳动英雄，因而形成对传统乡村上层人物的又一次有力冲击。劳动英雄和其他积极分子，以及下乡的干部一起，领导村民们去改造和发展农村的社会与经济。

（三）研究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的论文

可以分为几个层面：首先，集中研究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情况的论文，主要有刘艳萍、杨延虎的《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运动及其启示》（《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该文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的发展概况，阐明了劳模运动的作用和意义，并指出劳模运动积累的经验教训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该文着力于劳模运动的作用和意义及对当今时代的启示，主要是从劳模运动的积极性的正面角度来分析，没有对劳模运动中的一些缺陷做明确

交代，同时，在对现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上，主要是强调了劳模运动中的群众路线，没有分析现代社会发生的变化。陈舜卿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运动》（《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提出的一些观点，如劳模运动是中共中央在领导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建设特别是生产建设中所采用的一种重要的方法，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生产建设中的具体体现等，在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价值，其对劳模运动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和教训的分析，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是该文主要集中于劳模运动是发展生产和建设工作的有效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上，没有提及劳模运动中的模范工作者，也没有对劳模运动的运作机制、影响机制、改造和塑造这些社会作用进行分析。杨忠虎、张用建的《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述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高玉娇的《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研究》（《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是研究劳模运动整体情况的较新论文。

其次，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观察劳模运动的论文。王建华的《乡村社会改造中“公民塑造”的路径研究——以陕甘宁边区发展劳动英雄与改造二流子为考察对象》（《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以陕甘宁边区发展劳动英雄与改造二流子为考察对象，探讨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改造中“公民塑造”的路径，是近年来在劳动英雄运动方面探讨较为深入的学术论文。该文指出：“由于资料或关注问题的视角所限，学者们还难以理清这一过程的内在逻辑。有鉴于此，论文从梳理边区政府发展劳动英雄与改造二流子的材料入手，探讨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改造中‘公民塑造’的路径及其对现代国家建设的影响。”该文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劳模运动。王明生、董颖鑫的《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的政治分析》（《学海》2010年第5期），就劳模运动的基本目的、必要条件、发展方向和政治追求等从政治学的视角进行了政治分析。

再次，从新闻传播学、文学等视角看劳模运动的论文，主要有李晓灵的《延安〈解放日报〉典型化传播之反思》（《兰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该文以延安《解放日报》为研究对象，同时牵涉劳模运动。该文指出，在《解放日报》的传播历程中，正面典型化传播主要表现为新闻中的典型报道，1942年开始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事迹的宣传与传播即是其主流。而这两种典型化传播方式都是在劳动领域和政治领域展开的。延安《解放日报》典型化传播无论是其强大的传播效力，还是其无法掩

饰的缺陷，都是延安时代战争传播形态的产物。

韩国学者安荣银的《对旧秧歌的改造与利用——新秧歌形态探讨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一文，主要从文学史的角度探讨了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运动。该文通过对《兄妹开荒》、《刘二起家》等秧歌剧的分析，认为通过秧歌剧形式的演出和宣传，形象的塑造和升华，使得本来很普通的日常生活、学习经过相互“比赛”、“比较”、“超过”、“挑战”、“竞赛”，而迅速地英雄化。该文以秧歌的“调情”和“丑角”因素作为中心来专门讨论延安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限制下秧歌剧内容和形式的政治意识形态变化，颇有新意。

（四）一些硕士学位论文尤其是西北大学、延安大学等以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运动为研究对象，出现了一些初步研究成果

汪文庆的《陕甘宁边区的农村劳动英雄运动——以延安为中心所作的历史考察》（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2年），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主要从党的经济建设路线的角度和社会动员、基层政权建设的角度，在分析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地缘经济和政治文化状况的基础上，对陕甘宁边区以延安为中心的地区的农村劳动英雄运动所作的历史考察。该文的特色之处在于注意到了陕甘宁边区的生态环境、地缘经济和政治文化状况，而这一点以往通常被忽略。不过该论文没有对推动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发展的报纸以及民间文艺的宣传等做深入研究。张彬鹏的《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及其社会影响》（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9年），分析和论述了劳模运动的背景、缘起、相关政策及社会影响，它的特色在于把劳模看成一个群体，对劳模的类型及其角色特征特点做了一些归纳。黄玲的《1942—1945年陕甘宁边区模范村建设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0年），考察了边区模范村建设的缘由和发展状况，对模范村的类型进行分类，分析了模范村的建设特色以及意义；不过，对模范村在当时即已表现出来的明显缺陷和不足，论文并没有涉及。韩昀的《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延安大学，2012年），专门研究了特等劳动英雄这个群体的分布、特点，观察角度有新意。

（五）关于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的个案研究

主要集中于对吴满有、赵占魁等当时最出名的劳模的评述。如《陕甘宁边区赵占魁运动述论》（樊明方、胡雅各，《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主要介绍了赵占魁运动的背景，认为它是

大生产和工会改革的产物，是在先进工人与后进工人的斗争中开展起来的。依据运动开展的深度、广度和运动内容、形式的变化，赵占魁运动可以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作者认为，陕甘宁边区持续几年的赵占魁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对边区工业生产乃至整个边区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张静的《陕甘宁边区赵占魁运动述论》（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07年），对赵占魁运动开展的历史背景、概况以及运动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等方面做了较为系统的回顾和探讨，总结了在指导运动过程中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高娜的《陕甘宁边区吴满有运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延安大学，2010年）、艾亮的《陕甘宁边区赵占魁运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延安大学，2011年），分别研究了吴满有运动和赵占魁运动的发起背景、开展阶段，并分析了其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

三 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

通过上述对学术史的检视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尽管开始关注研究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运动，但仍然有如下几点重视不够：一是偏向重视边区政权对劳模运动带来的影响，而较少注意劳模运动和政权之间的互动关系。二是《解放日报》和其他文艺宣传形式对劳模运动氛围的制造、烘托，及群众对模范人物的理解模式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还研究得不够深入。三是以往研究多着眼于劳模运动所起的桥梁、骨干、带头作用，而对劳模运动对现代的启示意义揭示不足。四是以往研究着重关注劳模个人，较少关注由劳模推动的模范村乡的建设以及作为群体的劳模现象，其实这也是劳模运动中相当重要的一点。五是以往研究着重关注农业领域中的劳动英雄，而较少关注工人（赵占魁除外）、部队、机关、学校中的劳动英雄，尤其是对于模范工作者更缺乏足够的注意。六是日前对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资料运用还不够。七是对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中的一手档案资料运用还远远不够。

学术界上述有关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研究中相对薄弱之处，正是本书拟重点关注的地方，也是本书的创新之处。首先，运用许多新的档案资料。本书使用了陕西省档案馆馆藏的陕甘宁边区时期相关档案资料，是研究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有相当多的档案资料是在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没有提到和使用的。尤其是劳模运动的缺陷部分，本书

将使用大量第一手档案资料，以全面客观地分析和评价劳模运动。《解放日报》是本书的另一个重要资料来源。通过翻阅整个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系统地、立体地使用该资料来源，希望能对当时的劳模运动做全面的“复原”。本书希望通过结合原始档案与《解放日报》等系统的报道资料，对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做客观的事实描述。有鉴于此，对一些当时即原文在《解放日报》刊发，后经修改后存入档案或文集、选集的讲话等，并没有采用今天看来更权威的资料来源，而仍是选择了更忠实于原貌的《解放日报》。其次，探讨了目前处于研究空白状态的一些问题。本书用单独一章分析了以往学术界忽视的劳模运动的运作机制，如新民主主义政权与劳模运动的互动、奖励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劳模评选方式的变化、各级召开的劳模大会、劳模运动的辅助方式，等等。这些是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中的操作程序。由于本书使用了陕西省档案馆的第一手材料，能够比较全面清晰地展现这一过程。书中还注意到了非生产一线的模范工作者，注意到了“一揽子”英雄和模范村乡、模范单位的建设，注意到了民间文艺对劳模运动的宣传等现象，尽量突破以往研究中只重农业劳模、只重个人劳模、只重报宣传效应的研究状况。最后，较新的视角。以往研究关注较多的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劳模运动的组织和引导，本书意在探讨政权与劳模之间相互回应的状态，劳模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政府的安排，他们对劳模运动的开展同样起了推动作用，研究目光适当下沉。

本书在掌握大量文献资料基础上，以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为研究对象，在抗日战争这个大背景下，对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的发展概况进行综合考察，分析劳模运动与边区政府的互动关系，厘清劳模运动的运作机制以及模范工作者产生的过程，探究劳模运动过程中出现的模范乡村运动和劳模群体，论述以《解放日报》为主要代表的边区媒体对劳模运动宣传的形式和效果，考察各种文艺形式在其中的传播，进而重点分析劳模运动产生的社会影响，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及其对共产党政权和其他根据地的影响等方面。同时，利用大量第一手档案，分析劳模运动过程中存在的缺陷以及政府的应对措施。本书除了绪论外，主要分六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章主要论述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产生的渊源、条件及劳模运动的发展概况。陕甘宁边区在20世纪40年代遇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困难。借鉴中央苏区促进生产的竞赛与表彰传统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经验，在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动生

产运动，并出现了以农业上的吴满有和工业上的赵占魁等为标志的劳模现象。劳模运动由个人英雄发展到集体模范；范围由生产运动推广到文化、政治、军事及其他各项建设方面。

第二章主要分析劳模运动在边区政府指导下如何开展，劳模运动的运作机制以及模范工作者的产生，探究劳模运动过程中的模范乡村运动和劳模群体现象。陕甘宁边区建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认识到群众的基本需求并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在运动中注意发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并加以培养，且逐步由个人英雄发展到集体模范。在整个过程中，边区政府起组织作用、推动作用；劳模起桥梁作用，双方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相互回应的过程。陕甘宁边区奖励劳模的制度基本经常化、定期化，而且还写入了边区自治宪法，有了立法保证，可以认为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奖励制度的雏形。在整风运动、精兵简政和1943年延安高级干部会议后，抗战环境的变化和工作任务的需求使模范工作者运动开展起来。模范乡村运动的开展，是基于对“一揽子”劳动英雄的认识，在实际过程中不可能也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劳模在陕甘宁边区已形成一个群体，有自己的特性。

第三章主要论述边区主要媒体以及各种文艺形式对劳模运动进行的大规模宣传，并评析了宣传的形式和效果。面对边区内部的受众文化水平低，交通不发达的落后的传播环境，以及边区外部的“围剿”和封锁，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选择了大规模的典型宣传方式，塑造了一种政府和群众在战时情境下都急需的榜样模式——党领导和教育下的有新型劳动观念的、觉悟的、受人尊敬和爱护的农民（或工人等）榜样，在短时期内收到了统一思想、发动群众的强大效果。延安文艺座谈会及边区文教大会后，大量的文艺工作者下乡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创作的内容以表现工农大众的新生活、新人物为主，其中的“新人物”就是在党的政策下发家致富，拥护政府和军队的农民代表，以劳动英雄为主。在延安时期的戏剧里，传统的政治或军事舞台上的精英式的“英雄”被置换成庄稼地里、工厂房里、田间地头的“草根”英雄。

第四章主要论述并分析劳模运动产生的社会影响。劳模运动极大地促进了边区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劳动英雄或被作为党员的主要发展对象，或被团结、培养到边区政府中，成为乡村新的权威和领导核心。他们主动参与乡村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支援抗战。劳模运动成为共产党政权开展群众工作的一种较新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有利于共产党在边区、其他根

据地地位的巩固，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劳模评选制度和模式提供了借鉴和经验。在劳模运动的推动下，劳动光荣的观念深入人心，集体主义观念开始形成，根深蒂固的婚恋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妇女地位有所提高，社会风尚处于变动之中。

第五章专门讨论劳模运动开展中的缺陷。由于是一种较新的工作形式和方法，共产党执政的经验不足，加之抗战期间艰苦的环境和形势，劳模运动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主要原因是对劳模的定位和功能不清晰，并观察了边区政府对缺陷的一些应对措施。

余论部分回顾了陕甘宁边区时期几位著名劳模的个人状况，通过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劳模表彰制度，联系当今的劳模状况与主流媒体在宣传中的角色，分析了劳模运动对新时期主流意识的培养与核心价值观建设所起的作用，对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与当代劳模评选进行了比较和评价，借鉴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运动，提出一些看法与建议。

四 研究资料及方法

研究陕甘宁边区的基础资料主要来自于档案馆汇编的材料。笔者到陕西省档案馆收集的陕甘宁边区相关档案材料，成为本书的重要资料基础。

陕甘宁边区方面的文献资料，主要包括：《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由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联合编纂，共14辑，约450万字，由档案出版社自1986年至1991年陆续出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至1985年陆续出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共分九编，400余万字；《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陕西省档案馆内部资料）等由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组织编写；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下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下）》，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陕西省志和各县编纂的县志等。此外，本书将收集并运用大量公开出版的回忆录、日记、文集、年谱等资料，如

《回忆与研究》、《林伯渠日记》、《谢觉哉日记》、《博古文选·年谱》、《胡乔木文集》等。

同时，当时的报纸杂志，如《解放日报》、《新中华报》、《解放》周刊、《边区群众报》、《抗战报》、《北方文化》、《新华文摘》等也是重要的资料。尤其是《解放日报》，它是陕甘宁边区的一部资料翔实丰富的“活化石”，通过每日报道，勾画出系统的边区发展史。《解放日报》在当时所起的真正“新闻”意义上的功能相对较弱，因为它承担了边区生活“组织者”的部分功能，这恰恰是它能作为本书重要资料来源的原因之一。因为它除了系统、大规模地报道劳模典型和劳模运动，为研究者提供观察包含劳模运动在内的边区生产、经济发展、政策制定等资料；还提供了大量翔实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如领导人的讲话、会议、各种数据、调查研究材料，等等；同时，它集中报道了大量的边区百姓生活。所有这些都为研究劳模运动以至边区发展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当然，利用过程中需要注意新闻的真实性问题。本书将充分利用各类档案资料及《解放日报》等材料，通过对资料的梳理，较为深入、系统地考察延安时期的劳模运动，将此运动的脉络基本呈现，并进行客观评价。

研究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劳模运动，涉及历史学、新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本书在对史料进行收集、挖掘和梳理的基础上，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借鉴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理论和方法，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典型个案分析法等。对研究持评判态度，能较好地借鉴运用社会学和新闻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具体而言，比较研究法主要体现在：陕甘宁边区奖励劳模前后期在政策、选拔方式、效果等方面的比较；新中国成立后劳模表彰制度在不同时期的比较。典型个案分析法主要体现在：主要分析的个案有农村特等劳动英雄吴满有，工人特等劳动英雄赵占魁，部队特等劳动英雄张治国，妇女劳动英雄马杏儿、刘桂英等。

由于本书收集到的资料比较琐碎，很多资料运用起来会给人罗列事例的感觉。同时，劳模运动着眼点虽小，但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需要较为全面的知识和敏锐的观察力，本书在这方面还有待改进。